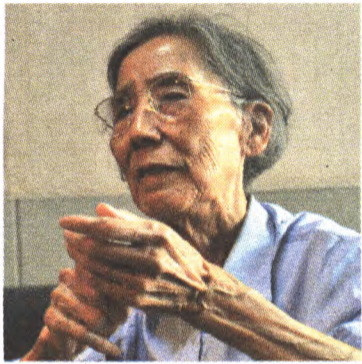


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

抗战记忆

曹力平：同仇敌忾打鬼子



曹力平，1927年6月5日出生，河北省平山县人，1942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2月入党。历任抗工小学教员，白求恩和平医院文教干事、196师政治部组织助理员。1954年12月转业到天津市卫生局工作，1970年6月到北京市卫生局工作，1982年3月到石景山区委组织部工作，1985年12月离休。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平山县岗南镇西岗南村，位于太行山东部边缘地带，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前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年，日本鬼子的铁蹄就踏进了我的家乡。他们挖壕沟，筑高墙，壕沟内任意杀戮，使得我的家乡方圆数里沟墙成网，纵横交叉，成了大面积的“无人区”。

当时我才十几岁，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我的家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暴行。日本鬼子每年春秋两季必来扫荡，见粮就抢，见田就烧，见物就拿，见人就杀。老百姓家家受难，无粮可吃，只能忍饥挨饿；有家不能归，只能四处奔逃，藏进深山。我的家族原本人丁兴旺，却有不少人惨遭日本鬼子毒手。其中，我二叔的独生女曹瑞瑞被日本鬼子刺死在山缝里，抛尸荒山，惨不忍睹；我小叔女儿曹瑞玲的丈夫因身体染病不能行走，他嫂子特意将其藏在山洞里，后来被搜

山的敌人发现，不由分说几枪将他打死；我堂叔姐是个寡妇，膝下一儿一女，原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本鬼子扫荡时期，男孩子舍命逃跑被日军追上将其杀死，女孩子躲藏不急，用被子裹着身体缩在炕角，被鬼子隔着被子连刺数刀而死，留下寡母一人困苦流离，日日以泪洗面，含恨哭嚎，最后发疯而死。

家乡被鬼子践踏，家人被鬼子杀害，哪个中国人提起日本鬼子不痛心憎恨，恨不得立刻就举枪杀敌，为家人报仇。我的家乡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抗日军，我虽未和他们一样拿起武器直接打日本鬼子，却也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日作出贡献。

参加儿童团，担任儿童团长，是最初的抗日活动。当时我带领着一群十几岁的同龄孩子，有组织地分布于村口，大家轮流站岗，盘问过路行人，检查他们的通行证，排查可疑身份，抓捕汉奸。

1939年2月，组织安排我去

抗工学校学习。抗工学校是当时晋察冀边区一所综合性的全脱产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教职员和学员都是由组织分配或保送而来。1942年我学成毕业，组织安排我留校任教。从此，我执起教鞭，履行起了用文化武装人民头脑的光荣使命。在学校里，教师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工作。学校的任务是，既要学时事、政治、军事、文化等，也要到群众中作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并组织群众抗击日寇扫荡，一起打游击。学校的教书生活既艰苦又充实，虽然我们遭遇了多次日军扫荡，光是学校搬迁就有三到四次，但是我们把前线抗日的英雄事迹及时讲给学员，把革命的火种播撒进学员心中，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批抗日先进分子。

抗日战争期间，我堂兄曹火星写了一首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这首歌经过中央领导人的修改，成了后来脍炙人口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他因此成为人民音乐家。我们正是天天吟唱着这首歌，信心满满，豪情万丈地坚持革命，期盼胜利的曙光早日来临。

1945年，长达8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听闻这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还在华北地方医院工作的我激动万分。艰苦卓绝的革命终于胜利了，中国人民终于熬出头了，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1946年12月，我在白求恩和平医院担任教员，协助医生护士照顾伤员。也正是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先生，他当时是一名医生，我们相遇相识并组建家庭。

如今，时光斗转，光阴荏苒，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周年。回想当年，日本鬼子的暴行，家人乡邻的惨死，抗日八年的流血流汗，所有苦难的、光荣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歌世代永不落。”

采写：赵欣然 摄影：侯达源

卫莫峰：十四岁就参加妇救会

我于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中峪村。沁源县地处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心，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日寇把这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多次闯入沁源实行疯狂的“三光扫荡”，我们村也难以幸免。

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每进村扫荡一次，我们就遭遇一次灾难。他们残忍至极，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屋就烧，所到之处，遍地哀嚎。全村200多户，五六十人都无辜被杀，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侥幸活下来的人也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忍饥挨饿。

为了生存，全村人民在太岳军区领导下，也开始了“反扫荡”。日寇每年春、秋两季必来扫荡，春天来烧我们的庄稼，秋天来抢我们的粮食。后来老百姓摸清楚了日本鬼子扫荡的规律，赶在他们扫荡前把粮食埋在

地里藏起来，老百姓都携家带口转移到山沟里，室空清野，把一座空城留给日本鬼子，等日本人走了再回到村里，把粮食挖出来，虽然这种法子免不了颠沛流离，粮食发霉，但是总比被敌人发现没活路没饭吃强。可是，总是“躲”“藏”也不是个办法，我们对日本鬼子满腔仇恨，大家都想着怎么“打鬼子，救中国”，正是在这种情绪激励下，村里很多人参军抗日，我的哥哥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抗日八路军，虽然参军不到一年就光荣牺牲，却成为我们全家的骄傲。我是女孩子，虽然不能像大哥那样抗日杀敌，却也用自己的方式积极投入支前工作。

1939年，八路军工作小组到我们村组织妇女救国会（以下简称“妇救会”）。我当时才十四岁，却已经很有主意了，听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于是我背着家人偷偷参加了妇救会，刚开始是

委员，后来因为表现出色，被推选为妇救会主任。当时妇救会就六七个骨干，我们白天忙生产，闲下来一起去到村子的庙里，铺开一张席子，为部队的战士做军鞋、军被。大家任劳任怨，起五更睡半夜，有时候通宵不休息。以每人平均一天10双军鞋的速度，在两到三年时间里，为部队做了几百双鞋。我的手因为做鞋子而磨出了血，又不能休息，以至于手指头磨损弯曲，几十年来一直隐隐作痛。

除了纳鞋底、做军鞋、缝军被，我们还接收照顾伤员。前线受伤的战士会住在老乡家里，我们就为他们请医找药，熬药、喂药、喂水、喂饭、端屎、接尿，洗衣做饭。虽然家里苦，可是我们宁愿自己穿得破破烂烂，也要让战士们穿好穿暖；宁愿自己吃的小米稀饭，也要把家里仅有的老玉米拿给他们吃。

战役期间，炮声隆隆，我和乡

亲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日以继夜地做军鞋、护理伤病员，整天为支前忙碌。为保证革命战士的安全，我们妇救会的同志日夜轮流站岗，听动静，看敌情，盘问过路陌生人；为了宣传抗日，凝聚人心，我们还组织妇女上识字班。

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我们为革命奔走忙碌，日子很苦，可是我们只想着早点把日本人赶走。1944年，党支部就告诉我日本鬼子快要投降了。我当时特别高兴，可是为了严守党组织的秘密，却只能在心里偷着高兴。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全村家家户户放鞭炮庆祝，那时候大家高兴激动的场面，我现在还记得。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想说，共产党真真正正为人民谋福利，感谢党带领我们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我们赢得了弥足珍贵的和平时光。

采写：赵欣然 摄影：郑焕亭



卫莫峰，女，1925年9月24日出生，山西省沁源县人，1943年10月25日入党，1983年10月在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办事处离休。